

《论衡》 文献学研究

智延娜 苏国伟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论衡》

文献学研究

智延娜 苏国伟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封面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衡》文献学研究/智延娜,苏国伟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01-015162-5

I. ①论… II. ①智…②苏… III. ①古典哲学—中国—东汉时代②《论衡》—
文献学—研究 IV. ①B234.81②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6425 号

《论衡》文献学研究

LUNHENG WENXIANXUE YANJIU

智延娜 苏国伟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25

字数:250 千字

ISBN 978-7-01-015162-5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论衡〉文献学研究》（HB14TQ023）研究成果
河北大学重点学科资助项目

<<<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王充的生平	1
第二节 《论衡》及其成书背景	3
第三节 《论衡》文献学研究的现状与意义	9
第二章 《论衡》版本研究	13
第一节 《论衡》的主要版本	13
第二节 《论衡》版本优劣之比较	31
第三章 《论衡》校注考证成果研究	40
第一节 完整的校注本	41
第二节 考证著述	75
第三节 《论衡》校注中存在的问题	84
第四章 《论衡》引书研究	92
第一节 《论衡》征引的经部古籍	95
第二节 《论衡》征引的子部古籍	175
第三节 《论衡》征引的史部古籍	209
参考文献	214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王充的生平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① 先祖因几世从军有功而受封于会稽阳亭，仅一年就失去封爵。祖父王汎“勇任气”而“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为避祸而举家徙居会稽钱塘，以经商贩卖为生。家族的气质一脉相承，王充伯父王蒙、父亲王诵，仍然延续了祖上“勇任气”之秉性，凭借勇猛好强仗势凌人，终因与豪绅丁伯等人家结下怨仇，不得不举家搬迁至浙江上虞。

王充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27年），自幼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为小儿，与侪伦遨戏，不好狎侮。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② 这种独特的个性，引起王诵的关注和重视，在王充六岁时就教他读书认字，“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臣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③ 八岁入馆读书，出类拔萃，品学兼优，读书日进。

① 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据黄晖《王充年谱》记载：《汉书·元后传》：陈完“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三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文、景间，安孙遂，字伯纪，处东平陵，生贺，字翁孺。为武帝绣衣御史，以奉使不称免……翁孺既免，而与东平陵终氏为怨，乃徙魏郡元城。”《王莽传》：“姚、嬖、陈、田、王氏……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为宗室，世世复，无有所与。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以别族理亲焉。”仲任特著“其先本魏郡元城”，其明为王翁孺之支庶欤？“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一姓”疑为“王姓”之伪。“元城王姓”，以别于其他族望也。

② （汉）王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代通津草堂本，1990年版，第278页。（如无特别说明，以下所引《论衡》均为此版本。）

③ 《论衡·自纪篇》。

东汉立国后，光武帝刘秀“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①一时间洛阳典籍丰富，名流云集。建武五年（29年），光武帝“起太学”，“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太学成为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和最权威的学术活动中心，在培养人才、促进文化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约在建武二十年（44年），王充入太学，受教于班彪，学习经史知识。在洛阳游学，王充经常到市肆里“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②。博览群书为其思想体系的建立及创作《论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太学完成学业后，王充虽有较强的人仕愿望，但因社会及其个人原因，仕途不达，终其生只做了几年地方属官。《自纪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③

章和元年（87年）后，王充的同乡友人、巨鹿郡太守谢夷吾上书汉章帝举荐王充：“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代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④汉章帝因此特诏公车署派员到会稽征辟，准备起用，但王充由于年迈多病又绝意于仕进，就没有奉诏庆征远行。此后，专心著述，直至病卒。

王充晚年生活清贫，而且疾病缠身。为了对抗疾病，他经常练习养生之术，还写出了关于养生保健的作品——《养性》。同时，他对《论衡》一书作了最后的修改定稿和编定目次。在王充六十多岁的时候^⑤，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垂暮之年，写下了《自纪篇》，收入《论衡》之中。“永元中卒

①（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贤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45页。

②《论衡·自纪篇》。

③《论衡·自纪篇》。

④（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贤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30页。

⑤刘盼遂认为王充在《自纪篇》“庚辛域际，虽惧终徂，愚犹沛沛，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中所说“庚辛”，应为和帝永元十二年。庚子，十三年辛丑，时王充年七十四五。此说误。庚辛者，指的不一定是庚子、辛丑，亦可指庚寅和辛卯，庚寅为永元二年（90年），辛卯为永元三年，若从上下文意来看，此处所讲庚辛，应为庚寅、辛卯，而王充写《养性》时，应为六十四五岁，这样才合于上文所说“年渐七十，时可悬舆”及范曄《后汉书·王充传》所说的“永元中卒于家”的说法。

于家”。^①

第二节 《论衡》及其成书背景

一、《论衡》的成书背景

《论衡》一书是王充的代表著作，是集他思想的大成之作。此书对当时已成为封建社会法典的“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等虚妄的学说，以及社会中的不合理、不公平现象，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猛烈的抨击，同时还对儒、道、法、墨等家学说分别进行了评述，在书中涉及农医、算术、天文等诸多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

王充家祖在北方大乱^②之前南迁，定居于会稽，因其位处东南一隅，远离政治中心，未受到兵燹袭扰，所以王家的基本生活得以维系。王充出生于光武帝建武三年，其时，新莽之乱结束，光武中兴开始，良好的政治环境造就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这就为王充六岁学字、八岁入馆等提供了可能。东汉初期太学的发展、游学的盛行，更是为王充进入京师洛阳、师从班彪、广泛涉猎书籍提供了可能。王充在京师洛阳期间，广泛涉猎书籍，博通百家之言。王充之说取精用宏，自成一家。“他吸收了孔子学说中的‘文质彬彬’的论点，发挥为‘文德’之说；吸收了孟子中‘不以辞害意’的论点，来说明‘经艺之增’；同时，也吸收了管子的‘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论点，来批判孔、孟过分重视礼乐的错误。他吸收了墨子‘薄葬’‘节俭’的观点，同时又吸收了道家‘天道无为’‘天道自然’的唯物观点，批判了墨家‘明鬼’的错误。他吸收了墨家‘尚用’和儒家‘为世用’的精神，来批判了道家‘出世’的思想。”^③

① 永元为东汉和帝年号，凡十六年（89—104年），永元中约为永元九年（97年），照此推算，王充逝时约为七十一岁。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推定王充为八十岁；刘盼遂在《论衡集解》中虽未明确推断王充逝年，但据其对《自纪篇》写作时间的推断，王充逝年也就在八十岁左右；胡适《王充的论衡》认为“永元中”大概为公元100年左右；徐斌《论衡之人——王充传》认为是永元八年（96年）前后；黄晖《王充年谱》判断王充卒于永元八年。

② 指新莽之乱、绿林、赤眉起义。

③ 蒋祖怡：《论衡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页。

从汉代的历史可以看出,自汉武帝刘彻提倡灾异符瑞起,到哀帝、平帝,一直盛行“天人感应”“谶纬”之说。特别是王莽当国、东汉建立,都充分利用了“天人感应”和图谶符命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拔高了谶纬的地位。当时许多文人、儒生,以图谶说经,取得显贵,更是推动了儒学谶纬化的进程。胡适曾说:“西汉末年最特别的是谶纬的书。”^①另一方面,从永平至章和年间,是东汉王朝从建立至经济恢复与强大发展的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也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特别是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虽仍处于幼稚状态,但较诸前代已有了很大的发展。谶纬与自然科学在同一时期的共同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与对立。所以,当汉代的君主和学者把谶纬之书“奉作神圣的经典,用来改元定历,决定嫌疑。这种荒谬可笑的迷信,自然要引起一般学者的反抗。桓谭、郑兴、尹敏在光武时已极力攻击图谶的迷信。但是迷信已深,这几个人又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当时的天人感应的儒教,故不能发生效果。王充也是这种反抗运动的一个代表。”^②《论衡》的写作动机,正是对这种矛盾与对立的反映。王充在《对作篇》中说:“孟子伤杨、墨之议大夺儒家之论,引平直之说,褒是抑非,世人以为好辩。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这里所谓“虚妄”与“真”、“实诚”与“伪”、“紫”与“朱”、“瓦”与“玉”之间的对立即反映了谶纬与科学之间的尖锐对立。王充写作《论衡》的目的更是对这种矛盾的集中反映,“《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正是由于“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所以他在“疾虚妄”“求实诚”。在九虚、三增、《论死篇》、《订鬼篇》中,王充对自然现象如雷、天、日、地等都发表了他的看法,利用自然科学的成就来“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与此同时,也集中批评了社会和伪书俗文中对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虚妄解释。

“细族孤门”的出身、家族的刚毅性格、仕途的失意和生活的屈辱困顿,自然而然地造就了王充愤世嫉俗的性格。他讥世嫉时,“达者未必知,穷者未必愚。遇者则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禄善,庸人尊显;命薄禄恶,奇俊落

① 胡适:《王充的论衡》,《现代学生》1931年第4卷第6期。

② 胡适:《王充的论衡》,《现代学生》1931年第4卷第6期。

魄。必以偶合称材量德，则夫专城食土者，材贤孔、墨。身贵而名贱，则居洁而行墨，食千钟之禄，无一长之德，乃可戏也。”^①写了《答佞篇》《程材篇》《谢短篇》《效力篇》《别通篇》《超奇篇》《状留篇》等文章来发泄“仕路隔绝”的失意和对现实选材标准的不满与失望，提出了自己的人才观念。但是，王充希望可以通过颂汉、献书来寻求政治上的出路，通过《宣汉篇》《恢国篇》《须颂篇》《齐世篇》等文章来“奉称国恩”“冀望见采”。^②王充在《论衡》中这种矛盾的表现正是他自然观与社会观矛盾的体现。

二、《论衡》及其篇章

王充一生著述丰富，写下了《讥俗》《节义》《政务》《论衡》等著作，但绝大部分已经亡佚，流传下来的只有《论衡》一书。

今本《论衡》共三十卷，全目八十五篇，《招致》一篇有目无篇，实存文字八十四篇。但据王充自述及后人所载，《论衡》原书在百篇以上，是毫无疑问的。《论衡·自纪篇》曰：“世无一卷，吾有百篇。”“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作书篇百有余，吾书亦才出百，而云太多。”《佚文篇》亦曰：“故夫占迹以睹足，观文以知情，《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据宋代高似孙《子略》记载：“客有难充书繁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为珍；龙少鱼众，少者为神乎？’充曰：‘文众可以胜寡矣，人无一引，吾百篇；人无一字，吾万言，为可贵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原书实百余篇，此本目录八十五篇，已非其旧矣”。实际上，王充死后百年，人们见到的《论衡》还是百篇本，裴松之注《三国志》引《会稽典录》谓“王景兴问士于虞仲翔”，“翔对曰：……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骆驿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盘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据人情之归极。”^③

自王充死后，《论衡》只在会稽一带流传。东汉著名学者蔡邕亡命入吴会，始见《论衡》，蔡邕见其论点大胆新奇，“叹其高文，度越诸子，恒爱玩而独秘之”。中平六年（189年），蔡邕自会稽返回长安时曾将《论衡》一并

① 见《论衡·自纪篇》。

② 见《论衡·对作篇》。

③ 高似孙：《子略》，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38页。

带回，但此书只供少数人助谈而已，未得到广泛流传。后来，王朗在会稽当太守时，也得到了《论衡》。建安三年（198年），王朗被曹操征还时，将此书带回许昌，《论衡》自此得在中原地区流传。王朗任会稽太守时，虞翻曾在其手下任功曹一职，既然虞翻读到的《论衡》“骆驿百篇”，那么王朗，包括蔡邕，所见到的自然也应是百余篇本了。但王朗带回的百余篇《论衡》并未流传下来。

曾在三国时期当过吴国武陵太守的谢承在《后汉书·王充传》中首先提出《论衡》为八十五篇。晋代葛洪在《抱朴子·喻蔽》中说：“子雅谓王仲任作《论衡》八十五篇，为冠伦大才。”葛洪长期生活在吴会之间，他当时所见《论衡》，也只是八十五篇本了。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王充传》中写道：“盖《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可见，在谢承时代，《论衡》的一部分篇章已经亡佚，经历了南北朝的混乱至隋唐统一，《论衡》一直保持八十五篇本。至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论衡》才得刻印，广为传播。

在现存八十四篇文字中，有无渗入后人的伪作，清初熊伯龙是有所怀疑的。他在《无何集》中认为王充属于儒家学派：“仲任盖宗仲尼者也”，“《论衡》之宗孔子，显而易见”，从而断定“《问孔》《刺孟》二篇小儒所作，断非仲任之笔”^①。熊伯龙的这个论据是站不住脚的。王充博采众家而自成一言，他在《论衡》中不仅批判地吸收了孔子的思想，还吸收了其他先秦诸子的思想。如，王充在《论衡》中多次引用《老子》的原文，还采用了“自然”“无为”等道家思想；《问孔篇》中“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就是对《管子·牧民》观点的发挥。既然熊伯龙的论证基础是错误的，那么得出的结论也就不足信了。

《论衡》八十四篇中，除《自纪篇》为王充在将逝之时所写外，其余八十三篇作于何时，少部分篇章是可从《论衡》篇中内容进行推断的，具体判定情况如下表所示。

^① 熊伯龙：《无何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页。

表 1-1 《论衡》中各篇的成篇年代^①

成篇年代	篇名	依据	补充说明
平帝永平年间	《诤时篇》	今闻筑洛之民，四方和会，功成事毕，不闻多死。（《诤时篇》）	“筑洛”指永平三年汉明帝大事兴修京师洛阳之事。
章帝建初、元和年间	《顺鼓篇》	建初孟年，无妄气至，圣世之期也，皇帝执德，救备其灾，故《顺鼓》《明零》，为汉应变。（《须颂篇》）	此处“皇帝”应指章帝。
	《明零篇》		
	《逢遇篇》	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后汉书·王充传》）	此处所列五篇，均为论证遇与不遇及人才优劣之事，可以推断为建初孟年王充被黜斥后愤慨之作。
	《累害篇》	贫无一亩庇身，志佚于王公；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钟。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自纪篇》）	
	《幸偶篇》	今则不然，作（进）无益之能，纳无补之说，以夏进炉，以冬奏扇，为所不欲得之事，献所不欲闻之语，其不遇祸，幸矣，何福佑之有乎？（《逢遇篇》）	
	《程材篇》	充任数不耦，而徒著书自纪。或亏（戏）曰：所贵鸿材者，仕宦耦合，身容说纳，事得功立，故为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数黜斥，材未练于事，力未尽于职，故徒幽思属文，着记美言，何补于身？众多欲以何趋乎？（《自纪篇》）	
	《谢短篇》		
	《齐世篇》	方今圣朝，承光宠，袭孝明。（《齐世篇》）	
	《宣汉篇》	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宣汉篇》）	
	《恢国篇》	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间，嘉德布流……五年，芝复生，六本；黄龙见，大小凡八。（《恢国篇》）	“元二之间”指建初一、二年；“五年”，指建初五年。
	《验符篇》	五年，芝草生泉陵男子周服宅土六本。（《验符篇》）	“五年”指建初五年。《宣汉篇》《恢国篇》《验符篇》为同一时期作品。
	《治期篇》	儒者称圣过实，稽合于汉，汉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说，使难及也。实而论之，汉更难及。谷熟岁平，圣王因缘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篇，为汉激发。（《须颂篇》）	此篇写作目的与《宣汉篇》《齐世篇》等相同，可以推断为同时代的作品。
	《佚文篇》	汉军云起，台阁废顿，文书弃散。光武中兴，修存未详。孝明世好文人，并征兰台之官，文雄会聚。今上即令（命），诏求亡失。（《佚文篇》）	

① 此表资料引自徐敏：《关于王充的〈论衡〉》，《新建设》1960年第10、11期。

续表

成篇年代	篇名	依据	补充说明
章帝建初、元和年间	《案书篇》	今尚书郎班固、台台令（史）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案书篇》）	据《后汉书·傅毅传》，建初中以傅毅为兰台令史。又据《班固传》、固继父叔皮作《汉书》，至建初中始成。此处也没有提到班固著《汉书》的事，可以推断此篇写作的年代为建初五年左右。
	《书虚篇》		《雷虚篇》提到建初四年的事，应写于建初四年以后。九虚应为同一时代的作品。又据《对作篇》，三增似应写在九虚之后，而《论死》《死伪》《订鬼》又写在三增之后。《薄葬篇》与《死伪篇》《订鬼篇》同一思想系统，从内容上考证，似为前者之续篇。《对作篇》则与《论死篇》《死伪篇》定于同一时代。
	《变虚篇》		
	《异虚篇》		
	《感虚篇》		
	《福虚篇》		
	《祸虚篇》		
	《龙虚篇》		
	《雷虚篇》	建初四年夏六月，雷击杀会稽靳（鄞）专日食羊五头，皆死。（《雷虚篇》）	
	《道虚篇》		
	《语增篇》		
	《儒增篇》		
	《艺增篇》		
	《论死篇》	今著《论死》及《死伪》之篇，明〔人〕死无知，不能为鬼，冀观览者将一晓解约葬，更为节俭。（《对作篇》）	
	《死伪篇》	今著《论死》及《死伪》之篇，明〔人〕死无知，不能为鬼，冀观览者将一晓解约葬，更为节俭。（《对作篇》）	
	《订鬼篇》	若夫九虚、三增、论死、订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觉也。人君遭弊，改教于上；人臣愚（遇）惑，作论于下。（《对作篇》）	
	《薄葬篇》		
	《对作篇》		

续表

成篇年代	篇名	依据	补充说明
汉章帝建初、元和年间	《讲瑞篇》	为此论草于永平之初，时来有瑞，其孝明宣惠，众瑞并至。至元和、章和之际，孝章耀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时俱应，凤皇骐驎，连出重见，盛于五帝之时。此篇已成，故不得载。（《讲瑞篇》） 案永平以来，讫于章和，甘露常降，故知众瑞皆是，而凤皇骐驎皆真也。（《讲瑞篇》）	此篇既云元和、章和之际，此篇已成，但又称章帝为“孝帝”，可以断定此篇写于章帝时代，而在章和二年“罢州家居”之后加以修改定稿的。
汉和帝永元中	《自纪篇》	从内容和语气来看，此篇似为王充绝命之辞。据《后汉书·王充传》，王充于汉和帝永元中逝世，永元共十七年，永元中约为永元九年（97年），照此推算，王充逝世时约为七十一岁，《自纪篇》是他的最后一篇作品。	

从上表考证，可以初步推断：《论衡》一书始写于汉明帝永平三年（60年），基本上写定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其中大部分篇章写于汉明帝和章帝建初年间，只有《自纪篇》写于汉和帝永元中。

第三节 《论衡》文献学研究的现状与意义

关于王充和《论衡》的评价与研究，自《论衡》诞生以来，一直未曾间断。两千年来，历代学者和思想家对其或褒或贬，争议颇多。这些成果散见于历代学者和思想家研究《论衡》的序、跋以及阅读、评述王充和《论衡》的各种文集和文章中。由于王充在《论衡》中“问孔”“刺孟”，被认为对圣人不敬；他在《自纪篇》中如实记述祖上不光彩的历史，又企图从历史上寻找证据，来证明父祖不好并不影响后代成才，被视为不孝；再加上乾隆皇帝明确表态，称王充“背经离道”“好奇立异”，《论衡》如同明代李贽的著作，宣传的皆为“歪理邪说”，致使清代学者不愿或不敢涉足此书。随着近代西方学说的传入，《论衡》逐渐开始被学者们所重视，特别是20世纪以来，《论衡》因其中所蕴含的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唯物主义精神，更是被推上了一个无可比拟的高度。关于《论衡》的研究成果不断推出，与其历史上长期受冷落的局面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前人对王充及《论衡》的研究，以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角度出发者为

多；也有学者从语言文字学角度，对《论衡》字、词、义进行考证。近些年来，学者更加注意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角度，通过《论衡》来研究王充的文学思想。相比较而言，从文献学角度研究者，成果最少，较为薄弱。本书正是从文献学角度对《论衡》的版本、校注考证成果及引书情况作一梳理，挖掘出其中蕴含的文献学价值。

自清儒用考据学的方法来对《论衡》作出考辨至今，《论衡》的文献学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成书、篇目、文字、版本、引书等方面。

第一，关于《论衡》本身的成书与篇目问题。这方面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吴则虞、朱谦之、刘盼遂、容肇祖、蒋祖怡、邵毅平等人的论著。

吴则虞说：“人们一致认为：王充的著作有四个集子，即《讥俗》《论衡》《政务》《养性》，而至今存在的只有《论衡》，其他三个集子都亡佚了。这个判断显然是缺乏充分根据的。据我研究的结果：现存的《论衡》八十四篇，其实包括了上面所说的四部书，《论衡》既是其中的一个集子的书名，也作为全集的总称。”^① 吴氏此语，表现出关于《论衡》篇目的两种不同认识：一是认为今本《论衡》是一部独立著作，除吴则虞外，张右源、刘盼遂、蒋祖怡、邵毅平等都赞成这种观点。二是认为今本《论衡》容纳了《讥俗》《政务》、《养性》等书，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朱谦之。朱谦之认为，《论衡》有三次撰集过程，第一次有《九虚》《三增》《论死》《订鬼》等篇，以《佚文篇》为总序；第二次撰集是将《论衡》与《政务》合并成一书，而以《对作篇》为其总序；第三次撰集，将《讥俗》《节义》《政务》《论衡》《养性》诸书，撰集成一巨册，即是约百篇多之定本《论衡》，而以《自纪篇》为总跋。对此说法，蒋祖怡、邵毅平均提出强烈质疑，认为作为一部完整的《论衡》，不存在兼容《讥俗》《政务》《养性》等书的情况。不过，由于缺乏充足的史料，这方面的争论还没有产生一个让人信服结论。

第二，关于《论衡》的版本、校勘和文字训诂方面，俞樾、孙诒让、孙人和、吴承仕、刘盼遂等先后作出重大贡献，而集大成者非黄晖莫属。

随着清代考据学的兴盛，清人开始重视《论衡》在这方面的价值，做了不少经史方面的考证工作。如卢文弨、孙志祖、梁玉绳、惠栋、姚范、朱骏

^① 吴则虞：《论衡的构成及其唯物主义的特点》，《哲学研究》1962年第4期。

声、陈鱣、蒋光煦、孙潜、陈揆、黄廷鉴、王振声、季锡畴、俞樾、孙诒让诸人都有关于《论衡》的考证。但和整个清代考据学的成果相比，清人对《论衡》的校注成果寥寥无几。如王念孙曾手校群书二三十种，而没有对此书进行校注。又如熊伯龙，《无何集》是用《论衡》的材料编成的，但却独不选《问孔》《刺孟》诸篇，他认为这些皆为“伪篇”，为“小儒”所作。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黄晖说是“因为他们只把《论衡》当作一种治汉儒今古文说的材料看。俞樾虽然是校正数十条，想是以余力致此，所以不像所校他书那样精当。孙诒让、孙蜀丞先生对这部书，用力比较多些，謚正若干条，才使这部书稍稍可读。”^① 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清人对《论衡》“非圣”“不孝”的总体否定限制了他们的整理工作。特别是乾隆帝明确表态，认为王充的《论衡》如同明代李贽的著作，宣传的皆为“歪理邪说”，致使清代学者不愿或不敢涉足此书。

清亡以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变化，《论衡》一书开始受到重视，研究论著不断涌现，胡适手校本、杨守敬校宋本及吴检斋手校本和齐燕铭《论衡札记》等先后问世。此后，对《论衡》文字训诂作出较大贡献的，当属吴承仕、刘盼遂二人，吴氏著有《论衡校释》，刘氏撰有《论衡校笺》《论衡集解》，黄晖则集其大成，著就《论衡校释》的皇皇之作。针对《论衡》注本中存在的误校、漏校情况，马宗霍的《论衡校读笺识》、张宗祥的《论衡校注》、杨宝忠师的《论衡校笺》，先师时永乐《〈论衡〉校注补正》中都有专门的论述。校注本及相关论文的陆续问世，使此书渐趋可读，为《论衡》的研究与普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同时为后人开辟了更多的研究空间，在本书之前，对注本的研究一直未能引起学者的重视，缺乏系统深入的论述。本书将就上述校注考证成果，对各家著述在校勘、注释及今译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做一较为系统的研究与论述。

第三，关于《论衡》的引书情况。在诸如段玉裁、陈乔枏、皮锡瑞等清儒相关著作，以及孙人和、吴承仕、刘盼遂等学者的论述，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对《论衡》的引书情况有所指陈，尤其是黄晖的《论衡校释》，在这方面的指证是最为全面的。黄晖《论衡校释》一书已经就《论衡》引书情

^① 黄晖：《论衡校释·自序》，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页。

况进行了详细考辨,取得了丰硕成果,不过一方面,其胪列出的各书说法,往往并未明确指认出于哪部著作,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少无判无断乃至误判误断之处,故而有进一步考究的必要。2006年,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生岳宗伟在博士论文《〈论衡〉引书研究》中对《论衡》引书的前提、概况以及引书的经史学意义和思想史内涵方面做了详细论述。但此文主要是探讨了《论衡》引书的经史学意义和思想史内涵,而未对《论衡》引书的具体情况和文献学意义进行深入研究。另外,《论衡》的引书研究也需要系统的梳理,并加以分类比较,从中发掘《论衡》校勘的价值。

《论衡》在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版本。随着对《论衡》研究的深入,其版本优劣及渊源应受到更多的重视与研究。版本既多,本与本之间就会产生内容、卷数以及文字等方面的差异。为了获取真知,就不能不考究版本的优劣,比勘各种版本之间的异同,以便判别是非,得出正确结论。版本优劣的判定是开展文献学研究的基础。

本书从以往关于《论衡》的研究视角作为切入点,对有关成果作一提纲挈领的梳理,理清前人研究的思路,以期发现一些前人尚未触及的空间。上述已有的关于《论衡》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本书考辨的起点。